

##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与 凝聚力的增强

邱树森 张廷茂

冷战结束后，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发展中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民族问题恶化的表现形式，民族分离运动又一次形成浪潮，在短短几年内扩及欧、亚、非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欧洲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亚洲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非洲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南北美洲的巴西、加拿大等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这股民族分离运动来势之猛、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分裂与分离现象，但总的趋势是中华民族内部紧密团结与凝聚力越益增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尽管世界上出现了民族分离运动，而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总结。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等问题。

##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集合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显著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从萌芽、发展到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 （一）先秦秦汉时期创造了中国各族多元一体化的条件

中国是拥有几十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了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受种族、地域、自然条件等影响，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各族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现了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性质。同时，各种文化在互相接触中产生自发的竞争，善于吸收别种优秀文化而又保留各自特色的文化得以进步发展，由此在各种文化多元格局中萌生了某种一体化的因素。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早在人类步入文明之前，各族先祖活动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已经非常鲜明。阿尔泰语各族活动在东北、北方到西北地区，汉藏语系藏满语族各族活动于西北青、甘一带到西南的山区、盆地，壮侗语族各族则在中南、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活动，苗瑶语族各族主要活动于中南和西南东部，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族多活动于西南边疆地区，华夏族则早已定居于黄河中下游。

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合并，成为形成中的华夏族的核心。炎帝族体中夏族统一各氏族部落建立夏朝，标志着华夏族开始

形成。从公元前 21 世纪到前 8 世纪上半叶，华夏族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不断融入周边若干民族部落，并逐渐消除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显示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因此，华夏族就非常自然地成为这片大地的中心。早在商代已有“大邑商”居中而称“中土”，四方诸侯称东、南、西、北“土”的区别，而周边各族则称为“方”。西周初“中国”一词已经出现，是指丰镐到雒邑一带的统治中心，所分封的诸侯国称“诸华”或“诸夏”，与之相对称的周边民族是夷蛮戎狄。在周人的心目中，“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sup>①</sup>。显然把周围各族都包括在周朝的疆域之内。三代以来，周边各族先后向华夏族的“中土”、“中国”入贡，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相互的政治关系。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由于周室衰微，各族大量内迁而威胁诸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族大融合高潮。早在周穆王末年，周、楚伐徐戎，徐戎之民数万徙彭城。到春秋战国时，由于东夷与诸夏杂处，差别日益缩小。北狄、西戎、南蛮也大批内迁。所以孔丘一直惊呼“礼崩乐坏”，强调“夷狄”、“诸夏”之别，“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sup>②</sup>。但是各族之间的交往、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血缘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了华夷一统、共为“天下”的整体观念。到战国时，秦、楚、燕竟与韩、赵、魏、齐争雄，最后被视为“夷狄”的秦国灭六国，并中国，秦、楚、燕等国自然地纳入“中国”的范围。秦始皇在全国设立郡县，实行有效统治，其范围“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

河为塞 并阴山至辽东”。汉代秦后 统一国家的疆域进一步扩大，更多的民族群体被纳入，华夏族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增多，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也随之传入周边民族之中，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汉朝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了羁縻政策，通过笼络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来实施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风俗习惯 基本不变 即多元因素依然保留和发展 但在臣属关系和中央政权对民族地区的控制上却日益加强，即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多民族现象，通过秦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诸多民族在一个政府管辖下的现象终于成为现实，因而为以后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各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短暂的统一后，很快就出现了大分裂的局面。匈奴、鲜卑、羯、氐、羌大举内迁 逐鹿中原 汉族建立的政权退到南方，形成了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于是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这次民族大融合是与各族的发展和大规模迁徙分不开的。在北方 除早已内迁的匈奴、氐、羌等族更向中原地区深入外，乌桓、鲜卑、羯等族也大量内迁，造成各族之间错居杂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分布的格局，在长期的共处中，相互增进了了解，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和适应在中原立国的客观条件，采取联合汉族地主的政策，学习并采用原有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吸收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这样，便大大加速了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在这次大融合的过程中，人口

占绝大多数、社会发展水平先进的汉族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影响极大，使他们逐步改变了原来的以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语言差别正在消失，汉语逐渐成为北方各族的通用语言，各族原来的生活习俗逐渐消失，服饰、发式、礼仪、节候等都改从汉俗；由于互相通婚，各族之间血缘上逐渐融为一体。因此，这次民族大融合的基本特点是北方各族趋向汉化，汉族共同体通过这次大融合进一步发展壮大。所以到北朝末、隋朝初时，汉化了鲜卑人与鲜卑化了的汉人已经很难分辨，民族界线逐步消失。

在南方，则因晋室南渡，除一部分北方汉人流入东北和凉州外，许多世家豪族和普通汉人纷纷播迁南方。到十六国时，由于中原混战，促使北方汉族再次大批南迁。东晋南朝先是设置侨州、郡、县，安置移民，历久年深，侨人与土著居民差别愈来愈小，遂“土断”入籍。南迁汉人大多移居淮河流域和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其中部分又复南迁，甚至辗转至岭南、云南。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东晋南朝时三吴（吴郡、会稽郡、吴兴郡）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荆州、扬州也获得很大发展，豫章、交广、闽江流域、洱海滇池地区都得到开发。当时蛮族的活动范围遍及今鄂、湘、豫、皖、赣、川等省，僚族居于黔、桂等地，俚族聚居在粤、湘、桂山区，爨从则是云南境内各族的统称。汉人有的因逃避赋役、有的因商业活动，纷纷进入蛮区俚村；南蛮之人也有迁出山谷，进入汉区谋生，或被掠卖、召募而入居内郡的。于是在南方也出现了民族杂居现象，接近汉地的少数民族进入了封建化的进程，或者与汉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广泛的民族融合，为隋唐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疆域远远超过汉朝，更多的民族群体纳入了唐帝国的范围之内，形成更大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统一多民族的唐帝国之内，各族经济发展、社会形态、政治体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以及民族渊源仍然不同，甚至同一民族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如东北靺鞨各部有的农业生产已较发达，有的还以射猎为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北方草原的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已进入阶级社会 过着游牧生活 西南的乌蛮、白蛮、朴子蛮 岭南的俚、僚 黔中道的苗、瑶 有的已有较发达的农业，有的仍然经营刀耕火耨的粗放农业，实行游耕，有的则仍从事原始采集和狩猎。周边新崛起的民族和各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展示了隋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多元性的图景。

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都督府和都护府，行使中央政府的政令。唐朝政府继承和发展了两汉的羁縻政策，采取“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 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办法 对各族的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表示认同 但“声教所暨 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 著于令式”<sup>③</sup>。都督、都护们皆受命于唐，其地为唐朝疆域，与内地州县相同，体现了它的统一性与一体性。当时的东北安东都护府 北方的翰海、安北、单于都护府 西北的安西、北庭都护府 西南的戎州、姚州、黔中都督府 岭南的桂州、邕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等，分别领辖 800 多个羁縻府州，唐朝政府通过这些羁縻府州的有效行政运行机制，把血缘不同，语言各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众多民族统一于帝国版图

之内，充分显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强大力量。贞观二十年（647年）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后，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sup>68</sup>所，号为“参天可汗道”，以便“通贡”。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表示唐太宗不仅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是北方各族的共主。这就表明，中国各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形成。

### （三）宋辽夏金元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军阀混战，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脱离唐朝统治，自立政权，出现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期。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通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全国又归于统一。所以，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唐亡后，我国进入了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半个多世纪中，梁、唐、晋、汉、周在中原建立王朝，未能实现国家统一。与此同时，十国林立，所以五代十国只能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伸与扩大。这时，契丹族兴起于东北，并在汉人帮助下建立了大契丹国（以后称辽），灭渤海而一统东北，继而实行南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sup>70</sup>，表明契丹统治者企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王朝的愿望，这虽是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创举，然而因契丹族并不具备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核心的条件，这一愿望终难实现。宋朝建立后，与辽、夏长期对峙；女真兴起，以金代辽，进而灭亡北宋，与南宋时和时战，南北分治。宋朝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它疲于应付边事，苟且偷安，并无一统中国之志。各政权之间力量的均衡，使全国始终处于割据状态中。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除了上述契丹、汉、党项、女真等族所建立的辽、宋、夏、金各政权外还有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朝、西辽、葛逻禄、吐蕃、大理等民族政权先后并存。这些民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非常重视辖区内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一般都采取了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这就客观上开发了边疆地区，缩短了与中原地区汉地的差距，形成了区域中心，从而为全国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到 13 世纪初，蒙古族在漠北崛起后，全国大统一的条件逐步成熟了。长期的民族战争给中原地区和各民族地区带来了社会不安定，也给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早已存在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障碍，全国各族人民厌恶无止境的争战，渴望早日拆除造成割据的壁垒。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了空前大统一的元王朝，因而使隋唐时期已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得以进一步发展。

首先，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民族共处与相互融合。大统一的元朝其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sup>⑥</sup>。在这个大范围内，各族人民可以自由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sup>⑦</sup>由于俘掠、流徙、经商、出仕、谋生、宗教等原因，元代的人口结构与成份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依元朝户籍计算，除了汉人户籍外，民户中新增了达达、回回、畏吾儿、河西、契丹、女真、也里可温、答失蛮、迭里威失等户。以镇江一地计，至顺年间侨寓的蒙古、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达 174 户，1148 口，上述各族沦为驱口的达 1273 人，两者相加达 2421 人<sup>⑧</sup>。这种“诸民相杂”的情况在历史上

是不多见的。也有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迁徙到边疆各地的岭北、云南、河西等地也出现了“居民杂处”现象。各民族交错杂居的直接结果是相互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相互融合加快了。例如由于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入居中原，终于形成了以汉语为共同语的、具有“大分散小集中”居住特点的回回民族。在甘、青地区则由于蒙、藏、维、回杂处形成了撒拉、保安、东乡、土族等新的民族。而迁居中原的契丹、女真、党项各族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在边地的汉人，有许多也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

第二，政府的政令推行至边疆地区。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有效地在地域如此辽阔的领土上实行统治，它在我国开创了以行中书省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建制；又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驿站，密切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之间的联系，使政令很快达于全国。今东北三省、西南三省、内蒙古、新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等省的少数民族，都归所在行省管辖，设宣政院直接管理吐蕃，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在如此大范围内推行一统政令，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

第三，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元朝政府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但又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了特殊政策。在岭北、东北的蒙古地区，除设立行省外，主要由分封的诸王实施统治；西北地区则分封给察合台及其后王，建立察合台汗国；原来的畏吾儿地区，因其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故保留由亦都护后裔继续管辖；吐蕃地区，中央专设宣政院，又专门扶持萨迦派，封其首领为宣政院使、国师、帝师，设官分职，并有以皇帝名义对吐蕃政权事务发布文告的权力；西南地区实行土司

制度，广泛任用各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称为土官，土官由朝廷任命，有一定品秩，可以世袭。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民族地区的多元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加以治理。

元朝百年统治虽然十分短暂，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却十分关键，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 （四）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固

公元 1368 年以朱元璋为首的汉族地主阶级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明朝虽多次出兵漠北、西北，力图彻底击垮北元和西北的察合台后王诸政权，但终因力不从心，又一次形成南北对峙。为了防止蒙古南下，明朝“东起鸭绿，西抵嘉峪”，设“九边”，布重兵，修缮长城，严加防备。对藏区，明廷则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侣和封贡、互市的政策，使其政治分散和教派分立，并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措施。在西北，终明之世多由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控制，明初曾一度攻占哈密，设八卫镇慑，但后来被土鲁番占据哈密，明军退走。在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明廷继承元朝土司制度并使之完备，但土司制度的弊端又促使明廷开始实行改土归流。东北地区则主要实行卫所制，奴儿干都指挥司设 384 卫、24 所，辖区西起斡难河，东达于海，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日本海。任用女真等族首领为羁縻卫所长官。明朝的统治范围虽然远未达到元朝的规模，但在其统治的边疆民族地区，施政措施颇为得力，因而进一步稳固了元朝以来多元民族凝聚一体的成果。

清朝建立后，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拓展边疆，巩固了元朝开拓的我国版图和领土，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清政府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击溃了准噶尔部的叛乱，统一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盟旗制度。后来又进一步统一天山北路，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天山南路，设立伊犁将军，并于 19 世纪下半叶正式建立新疆行省。在西藏地区，派驻藏大臣，设噶厦政府，维护和巩固了西藏地区与中央的统一关系。在西南、中南民族地区，继续实行土司制度，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台湾也设府设省。清朝前期中国又一次恢复了辽阔领土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境内的 50 多个民族基本定型，各民族聚居区也趋于稳定。

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入我国。共同的命运使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辛亥革命后，创建了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废止了封建王朝所谓“天下社稷”的朝代国号，表明中国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即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sup>④</sup>至此，中华民族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大一统的格局已十分稳固。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中华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彼此依存、吸引，形成一股巨大的内聚潮流、内聚力量。历史上虽然有过分裂、战争，但总是汇流在一起，走向统一，结合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

### （一）政治上的向心性

“中国”一词在古代本来就只是地理、地域文化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和《尚书》中的“中国”含有“都城”、“国中”、“王畿”之意。直到东周才作为一个专称，成为特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地理概念。到三国时，占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曹魏自称“中国”，这就使中国的概念以地理概念发展到政治或区域文化概念。此后，“中国”一词除用以称呼中原地区外，还用以称呼历史上曾统一全国的中央王朝，这一称法一直沿用到明清。但从夏、商、周到明清，没有一个中国王朝把“中国”作为自己国号的。可见，历史上所用的“中国”一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一种地域政治和文化类型的区分，或是一种政治地位的名称，并逐渐成为王朝的代称。由于它沿用日久，又成为我国国家名号的专称。

“中国”的概念不是专指任何一个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而是众多民族政权都包括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地区性政权均为称为“中国”，而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同样称为“中国”。同样，汉族建立的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称为“中国”，而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也被称为“中国”。以“中原为正统”的政治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地区是全中国的核心，周边各民族及其政权，包括汉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都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承认中原是核心。

唐朝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中原王朝成为全中国的核心。北方各族共尊唐帝为“天可汗”，东北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典章制度模仿唐制，“大抵宪象中国制度”；云南地区的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南诏，“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唐朝与吐蕃统治者

双方会盟 称“舅甥二主 商议社稷如一 结立大和盟约 永无沦替。”所以 唐朝政府自豪地称：“维唐承天 抚有八纒 声教所臻，靡不来廷。”<sup>⑩</sup>进入五代十国时，五代居中原，故自称为中国 尽管梁、唐、晋、汉、周五朝中唐、晋、汉三朝皆沙陀人所建，而十国不称中国。宋、辽、夏、金 都要争当中国的统治者 金灭辽、北宋后 据有中原之地 南宋人反称之为“中国”。之后 元朝实现大统一，蒙古族的皇帝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标准，“稽列圣之洪规 讲前代之定制 建元中统，绍百王而纪统”定国号为“元”。新王朝的统治者 丝毫没有因为他们是蒙古族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代表者。

儒家思想中很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别，其消极的后果就是实行民族歧视，推行大汉族主义。但是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往往能抛弃儒家的囿见 反对“番汉之限” 例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说过：“有生之民 皆为赤子 何番汉之限哉！”<sup>⑪</sup>这种观点少数民族是普遍欢迎和接受的。北宋时中国西北有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朝，尽管他们已皈依伊斯兰教，从文化影响来看属伊斯兰文化圈之内，但其著名作家马合木·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词典·桃花石》中把喀喇汗朝统治下的喀什噶尔称为“下秦”，即中国西部 宋朝则称为“上秦”即中国东部。在喀喇汗朝的人看来，宋朝与喀喇汗朝都是中国。当时中亚人称中国为“桃花石”，喀喇汗朝中有不少大汗在自己的称号中冠以“桃花石”之名，如西部喀喇汗朝第一位大汗伊卜拉欣·本·纳费尔称“桃花石博格拉汗”意为“东方和中国之王”其子纳赛尔则称“东方与中国之苏丹”。西喀喇汗朝大汗中还有好几位在称号中冠以“桃花石”的称号 以表示他们是中国之王 该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清朝雍正皇帝在批驳反满的汉族文士时说：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怨’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罚之，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sup>①</sup>

雍正主张华夷无别，不分地域，以德为王，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强烈的向心意识。他的观点在理论上、实践上，对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

## （二 经济上的互补性

我国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国家，全国的地势大体上是西高东低，北方多平原，南方多丘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汉族主要居中原和东南、东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主要居边疆地区，即西北、西南、北方、东北地区。

各民族由于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不同，形成了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的特点。

汉族居住的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比较湿润，因而适宜于农作物的种植。所以，历史上的汉族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在此基础上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整个经济在全国各民族中居于领先地位。早在明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进入近代后，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也首先诞生于沿海发达地区。我国最主要的大城市也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地形极其复杂，不仅有世界最高的屋脊，而且有世界最低的盆地，高山大川纵横交错。西北部的青藏高原和西南部的云贵高原构成了我国地形中最高、最低的阶梯。这些地区

中布满了大沙漠、大盆地、大峡谷、大江河。西部民族地区不仅地形复杂，而且气候多变，雨量分布很不平均。以上这些自然条件，加之地质构造特殊，造成西北民族地区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十分丰富。例如，宁夏的煤、磷、铁、盐，新疆的石油、煤、铁、黄金，西藏的铬、铁、铜，甘肃的石油、煤、铁、有色金属，云南的有色金属。西北还盛产各种马、牛、羊及珍禽异兽。

北方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虽然生态环境悬殊，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里有丰美的草场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又有肥沃的耕地和各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矿产种类繁多，铁、煤、部分有色金属，其储量居全国前列。

东北民族地区则以森林、草原闻名全国。

上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决定了各地区、各民族经济上的自然分工。在我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内，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各地区、各民族，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原汉族地区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比周边民族要高一些，但对民族地区的特产和某些先进生产技术是十分注意吸收的。千百年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展开的“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是经久不衰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以马为主的畜产品，中原王朝和中原人民是赖以装备军队、发展交通运输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不可少的。唐代宗时，每年向回鹘购买马匹达数万匹至 10 万余匹不等。到了几百年后的明代，中原对马匹的需求依然不减，来自西北的吐鲁番、哈密回回，其入贡主要物产就是马匹。明景泰三年（1452 年）时，西北和中亚各族入朝贡马的地面达 121 处以上，所贡马匹有的达数千匹之多。少数民族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后，对汉族

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元初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姊妹那里学会了先进棉纺技术，首先在松江地区推广，进而推广到全国，对我国古代棉纺织业的发展，起了不少估量的作用。“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sup>⑩</sup>不几年，松江即有“衣被天下”之誉。据研究，制茶、煮盐、冶铁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产技术，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汉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往往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植物品种、手工业产品、生产技术常常是先从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然后再传入中原汉地。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带回苜蓿、葡萄种子。以后又有胡桃、胡椒、胡葱、胡麻、胡瓜、胡桐泪、胡荽、胡萝卜、蚕豆、红花、茉莉、指甲花、阿魏、五食子、苜蓿、枣椰树、菠菜、蓖麻、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果、西瓜、水仙、莴苣、安石榴等等，以及苏合香、没药、青木香、安息香等各种香料<sup>⑪</sup>。棉花产自印度，古称“吉贝”（由梵文转译），早在东汉三国之际即已传入西域吐鲁蕃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然后分别从陆道和海道传入中原汉地，至宋元时开始全面种植。来自中亚、西亚和纺织品及其生产技术，如纳失失（织金锦缎）、速夫（毛织品）是元代回回人传入的。

少数民族对中原汉地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生活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少数民族从中原换来粮食、茶、器具、麻布、丝绸等，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输入，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汉时传入西域的“穿井法”在大宛、西域城邦各国广为传播，发展成为以后的坎儿

并，对西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契丹的崛起，无疑与汉人大批迁徙到契丹境内有关，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使契丹社会的进步，文化赋税制度也随之传入，契丹“既尽得燕中人士 教之文法 由是渐盛。”<sup>⑩</sup>蒙古兴起前，各部与辽、金有官市贸易，辽、金统治者严禁生熟铁输入蒙古，但蒙古各部通过私人贸易仍能得到大量生熟铁，到金代时河东陕西之铁钱流入蒙古尤多，于是生产工具得到改进，车马装备也有改观，不仅战斗力大大提高，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

### （三）文化上的多元性

世界各国中，像中国这样多元文化形成了一体化，并构成了中华灿烂文明，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和地理条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趋向。各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宗教、周围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影响，因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人口多，分布地域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因而汉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起着主体的作用。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

中原地区人们常称之为儒学文化圈，因为儒学作为中国的统治思想历时最久，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意识、行为准则、伦理道德、文化科技影响最大。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对其他宗教，包括外来宗教文化并不持排斥态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东汉中期逐步形成后，把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但到魏晋时，即以神仙方术与